

谢知锦案、徐州鸿顺造纸案分析

郭子昂 / 2120191973 / 法律硕士（法学）

要求：1.解析案例中当事人的请求与抗辩的理由及法院裁决的理由。

2. 分析案例中的法律依据及其适用。

案例一 谢知锦案		
当事人主张	一审	<p>■原告请求：</p> <p>四被告转让、开采有共同的过错，破坏的 28.33 亩林地不仅本身完全丧失了生态功能，而且影响到了周围生态环境功能及整体性，尤其是山顶被破坏的林地，将会严重影响和改变周边及山下动植物的环境，导致生态功能脆弱或丧失。原告作为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有义务参与、督促责任者恢复林地植被，保护生态环境，又因被告开采毁坏的林地植被有可恢复性。</p> <p>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规定，请求：</p> <p>1.判令四被告在三个月内清除南平市延平区葫芦山砂基洋恒兴石材厂矿山采石处现存工棚、机械设备、石料和弃石，恢复被破坏的 28.33 亩林地植被（山顶 19.44 亩、原塘口 8.89 亩）；</p> <p>2.四被告不能按第一项请求三个月内恢复林地植被的，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10.19 万元，由第三人用该款组织恢复林地植被；</p> <p>3.判令四被告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 134 万元；</p> <p>4.判令四被告承担诉讼费；赔偿原告自然之友支出的律师服务费 96200 元、评估费 6000 元、工作人员差旅费 56537.9 元；赔偿原告福建绿家园支出的律师服务费 25261 元、工作人员差旅费 19000 元。</p> <p>■ 被告主要抗辩理由：</p>

	<p><u>原告自然之友主体不适格。</u>自然之友的登记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18 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发证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7 日，有效期为 2013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即依法批准设立时间是 2013 年 9 月 27 日。且性质是由杨东平、张赫赫、李波利用非国有资产、自愿举办、从事非盈利性社会活动的社会组织，系独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并非由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变更登记的法人。而本案原告起诉时间是 2015 年 1 月 1 日，自然之友依法批准设立至本案起诉时间才一年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原告自然之友主体不适格。</p> <p>■第三人主张：</p> <p>1.原告直接将延平区林业局列为本案第三人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是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参加诉讼或法院依职权追加。原告在起诉时在诉状中直接列第三人，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p> <p>2.对于破坏种植条件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的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于被告谢知锦、倪明香、郑时姜、李名掣因采矿造成的植被破坏，应由本案第三人国土延平分局责令其缴纳复垦费，用于专项治理费用，负责监督实施恢复被破坏的植被。</p> <p>3.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矿山复绿”行动方案》的通知已明确“矿山复绿”的责任主体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交通干线两侧“青山挂白”治理工作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因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林木采</p>
--	--

		<p>伐及洪灾滑坡引发的无林木迹地，由林业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植树造林修复；因矿山开采引发的“青山挂白”，由国土资源部门负责组织恢复治理。</p>
	二审	<p>■上诉人（原审被告）：</p> <p>1. 原判对上诉人是否构成侵权的主观过错未予查明，对于当地政府、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当时制定的政策以及行政违法、不作为没有查明认定，将应当由当地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承担的责任全部归责上诉人承担，缺乏公平公正。</p> <p>2. 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的评估意见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p> <p>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不能适用于本案，原判适用法律错误。</p> <p>4. 被上诉人自然之友提起本案诉讼时，依法设立时间不足五年，即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达不到连续五年，不符合原告主体资格。综上，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p> <p>■被上诉人（原审原告）：</p> <p>1. 上诉人在未经审批许可的情况下实施开采行为，主观过错明显，当地人民政府、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当时制定的政策以及行政违法、不作为与上诉人的环境侵权后果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p> <p>2. 评估意见系聘请具有森林资源评估能力的专家，对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提出的专家意见，并出庭接受询问，应予采信。</p> <p>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均规定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应包括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可以适用于本案。</p> <p>4. 自然之友已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满五年以上，符合原告主体资格要件。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p> <p>■ 原审第三人：</p> <p>原判认定其作为对环境保护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执法部门，与本案处理结果没有民事法律利害关系，不应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第三人承担责任，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p>

		法院予以维持。
	再审	<p>■谢知锦申请再审称：</p> <p>（一）二审判决认定谢知锦采矿占用林地，严重毁坏林地原有植被，属于破坏生态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缺乏证据证明。</p> <p>1.谢知锦边开采边审批、使用林地完全符合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p> <p>2.谢知锦缴纳了生态恢复保证金、林地管理费、资源管理费，支付了青苗补偿费，不当再承担林地功能、林地植被恢复责任等。</p> <p>3.谢知锦提交了办理案涉矿山采矿许可证延期、扩大开采范围申请，其中包含办理使用林地权申请，案涉矿山经年检合格。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林业主管部门对矿山只收取费用，没有及时通知停止开采、办理使用林地许可手续，应当承担责任。</p> <p>4.案涉矿山因合福铁路建设列入压覆矿征用范围，京福闽赣公司下文要求所有压覆矿停止开采时才通知原矿主停止开采。矿山采矿许可证延期、扩大开采范围审批暂停，原有采矿许可证应视同有效，恢复矿山植被的义务由压覆矿征用部门负责。</p> <p>（二）二审判决认定谢知锦等共同侵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谢知锦边开采边审批、使用林地合法，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存在共同侵权的事实，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由地方政府承担侵权责任。二审判决认定谢知锦等共同侵权造成损害，承担连带责任，适用法律错误。谢知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p> <p>■自然之友提交意见称：</p> <p>（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p> <p>1.谢知锦非法占用林地，造成林地、植被严重破坏的事实有大量证据证明，谢知锦也未否定；</p> <p>2.谢知锦明知采矿需要办理行政许可手续，其在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情况下开采，过错十分明显。</p> <p>（二）谢知锦申请再审的理由不成立，也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推翻二审判决。</p> <p>1.《南平市延平区关于鼓励开采和加工石材的优惠条件》关于先登记，先开工，然后再办理其他手续的规定，并未否定行政许可制度，地方政策亦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抵触。</p> <p>2.缴纳了生态恢复保证金并不等同于开采取得行政许可，也不意味着可以免除生态修复责任。</p> <p>3.行政主管部门的年检不是对超采、扩采违法行为的确认。</p>

	<p>4.闽赣公司下文所有压覆矿停止开采,不能证明谢知锦就此停止开采。闽赣公司与谢知锦之间是补偿关系,将原采矿许可证视为有效是用于解决补偿问题,不能以此认为谢知锦开采行为合法。</p> <p>5.地方政府行使行政管理监督职责和谢知锦等承担的破坏生态责任,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谢知锦违法采矿、占用林地造成林地、林地植被严重破坏,应当依照《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承担破坏生态责任,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谢知锦的再审申请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p> <p>■福建绿家园提交意见称:</p> <p>(一)谢知锦没有办理使用林地许可手续,占用林地有过错。首先,对于谢知锦申请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应由林业主管部门作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向林业主管部门去函只是为了交流工作,函件内容和形式都不符合使用林地许可文件的要求。其次,一审、二审审理期间,大量证据证明谢知锦等非法开采,占用林地,造成林地原有植被严重毁坏。另外,生态恢复保证金和森林植被恢复费的缴纳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并非同一性质。</p> <p>(二)谢知锦是案涉矿山生态环境恢复的义务人。谢知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矿山产权归闽赣公司所有,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闽赣公司现在或者将来会改变案涉矿山林地用途。谢知锦关于矿山因合福铁路建设列入压覆矿征用范围,恢复矿山植被的义务由压覆矿征用部门负责的理由不能成立。谢知锦的再审申请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p>
争议焦点/ 法律适用/ 法院判决	<p>本案二审法院判决自然之友具有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如何认定“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的起算点。</p> <p>“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的起算点应为开始实际从事活动而非登记之时。《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第 1 款规定,满足“(一)依法在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两个要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此可见,“连续五年”只出现在第二个要件当中,仅仅针对“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而言,而不应被理解为起诉人必须自登记之日起至提起诉讼时止已连续存续满五年以上。在本案中,原告自然之友的登记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18 日,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书的发证日期为 2013 年 9 月 27 日,而自然之友起诉的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1 日。因此,无论自然之友的登记时间还是发证时间都距离本案起诉时间不足五年。但</p>

	<p>是，自然之友的前身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早在 1993 年即已成立并开始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距起诉时间已超五年，因此应当认定自然之友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已满五年。</p> <p>南平中院和福建高院均支持“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的起算点应为开始实际从事活动之时，认为“根据《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原告自然之友系 2010 年 6 月 18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登记成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虽然其自登记之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成立不满五年，但其在登记前已经依法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至提起本案诉讼前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已满五年，并无违法记录。因此，原告自然之友在本案中符合‘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的主体资格要件。”</p>
法理分析	<p>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法律规定的适格原告，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环境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承担环境民事责任而由法院依照诉讼法实施的民事诉讼程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则是指依法启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用立法的形式确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将《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进一步解释为“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指向了《环境保护法》，该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也规定了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的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司法解释。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仅限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且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是法律规定的条件范围内，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即不属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p> <p>根据原被告的争议焦点，本案焦点在于原告自然之友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以上法律规定的情形。原告自然之友的登记部门为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登记时间为 2010 年 6 月 18 日，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即“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而《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所规定的第一款第（二）项与第（一）项是否互为条件，依被告的观点则是原告自然之友必须自登记后专门从事环保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原告的观点为法律并不强制要求登记后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登记前的从事的环境保护公益活动时间也应计算在内。由于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性，这就需要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承继对法律的信仰，严格服从法律，使任意裁判得到最大限度地避免，从而尽可能的降低自然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在本案中，法官也必须严格遵循民事诉讼法、环境保护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法律规定进行司法裁</p>

	<p>判。但现实案件中的情况往往复杂多变，不断恶化的环境质量促使更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而与日俱增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诉讼主体不一定完全符合法律的硬性规定，且法律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与不完备性，这就需要司法实践者进行恰当的法律解释，本案判决根据立法精神，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条文含义结合法律规定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立法目的来进行解释，采信了原告方的观点，判令被告等人承担生态环境破坏的责任。</p>
--	---

案例二 徐州鸿顺造纸案		
当事人主张	一审	<p>■原告请求：</p> <p>公益诉讼人主张，被告连续三年违法排污且每次都加大污水排放量，有理由推定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被告的防治污染设备未能有效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告应当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被告还应当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的损失。检察机关发现被告违法行为后，向徐州市符合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条件的三家社会组织发出督促起诉意见书，建议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三家社会组织复函称目前尚不具备开展公益诉讼的能力。公益诉讼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规定，提起本案诉讼。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如被告无法修复因其污染行为而受损的环境，则应综合考虑以上各方面确定被告的赔偿责任。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p> <p>1、将其污染损害的苏北堤河环境恢复原状，并赔偿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如被告无法恢复原状请求判令其以环境污染损害咨询意见所确定的人民币 26.91 万元为基准的三倍至五倍承担赔偿责任；</p> <p>2、承担本案专家辅助人咨询费用 3000 元。被告所赔偿的环境损害费用应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用于修复生态环境。</p> <p>■被告抗辩：</p> <p>被告是民政福利企业，且属于废旧物资再利用型企业。违法排污及处罚事件之后，加大环保治理工作，将注册资金由 780 万元增加至 6000 万元，新增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污水治理改造，增加设备投入，确保防污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被告虽愿意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赔偿，但认为：</p> <p>（一）被告不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由于被告周边企业较多，所有工业废水均排放至苏北堤河，环境治理工作需要多家企业共同完成，且经过环保设施改进，被告现在没有污水排放，苏北堤河应当已经达到Ⅴ类水质标准；</p> <p>（二）被告以前违法排放的废水污染物成分以有机物、木质物、纤维素为主，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极少，生态环境受到的损</p>

		<p>害较小，恢复较容易，公益诉讼人认为排放 2600 吨废水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数额为 26.91 万元，计算过高；</p> <p>（三）公益诉讼人要求被告以 26.91 万元为基数计算三至五倍赔偿，不能成立；</p> <p>（四）被告已在两次行政处罚中缴纳共计 15 万元罚款，该款项应当用于环境治理，应从赔偿数额中扣除。综上，被告愿意倡导环保、努力改善环境，支付相应赔偿数额，请求法院综合本案相关事实以及被告企业发展状况，合理确定被告所应承担的责任。</p>
	二审	<p>■上诉人（原审被告）：</p> <p>鸿顺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公益诉讼人起诉或改判赔偿生态修复费用 4.5 万元。</p> <p>事实和理由：</p> <p>（一）公益诉讼人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受理条件，应当驳回起诉；原审法院超诉讼请求判决，审判程序违法。公益诉讼人关于判令鸿顺公司以 26.91 万元为基数的三倍至五倍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数额为约数，诉讼请求不明确，应当依法驳回起诉。公益诉讼人没有起诉请求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原审判决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属于超诉讼请求判决，审判程序违法。</p> <p>（二）鸿顺公司不应当承担生态修复费用。鸿顺公司虽违法排放废水，但所排放废水的成分以有机物、木质素、纤维素为主，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极少，由于水体的自我净化，苏北堤河水质未受影响，排放废水行为未造成生态破坏。</p> <p>（三）原审判决将 2.035 倍作为计算本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计算系数取值过高。鸿顺公司生产瓦楞纸采用全废纸造纸工艺，造纸废水主要为废纸的碎浆、筛选、浮选及抄纸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因无脱墨、漂白等工艺，与脱墨废纸浆生产工艺相比，排出的废水污染负荷少，生态修复容易。依据“虚拟治理成本法”环境损害数额赔偿倍数取值范围为 1.5-3 倍，本案应当按照 1.5 倍取值。</p> <p>（四）原审判决以 26.455 万元为基数，以其三至五倍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服务功能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服务功能损失认定无事实依据。苏北堤河因水体流动及自我净化，水质早已自然恢复，无需恢复原状，也不存在服务功能损失。</p> <p>（五）原审判决未将鸿顺公司已经缴纳的 15 万元罚款予以抵扣不当。铜山区环境保护局曾经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对该公司处以罚款。水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水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该公司缴纳的罚款应当用于改善环境，与本案赔偿资金的使用目的一致。已经缴纳的罚款理应在赔偿金中予以抵扣。</p>

		<p>■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p>
<p>争议焦点/ 法律适用/ 法院判决</p>	<p>一审</p>	<p>■争议焦点：</p> <p>（一）被告应否承担恢复原状的法律责任；</p> <p>（二）公益诉讼人主张被告 2014 年、2015 年两次排放的共计 2600 吨生产废水，相应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为 26.91 万元，能否成立；</p> <p>（三）公益诉讼人主张如被告不能将其污染的环境恢复原状，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其数额以 26.91 万元为基数计算三至五倍，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p> <p>（四）被告已缴纳的行政罚款 15 万元应否在本案的赔偿中予以抵扣。</p> <p>■法律适用：</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五）项、第（六）项、第六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 •《人民法院审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试点工作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 <p>■法院判决：</p> <p>一、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及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共计人民币 105.82 万元，支付至徐州市环境保护公益金专项资金账户。</p> <p>二、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公益诉讼人为本案支付的合理费用人民币 3000 元。</p> <p>案件受理费 14324 元，由被告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负担。</p>
	<p>二审</p>	<p>■法院观点：</p> <p>（一）徐州市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明确，原审判决未超公益诉讼人请求范围。</p> <p>（二）污染物排放点的环境质量已经达标不能作为拒绝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理由。</p> <p>（三）原审判决以 2.035 倍作为以虚拟治理成本法计算生态环</p>

	<p>境修复费用时计算系数并无不当。</p> <p>（四）以查获的排放废水量的四倍计算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具有事实 and 法律依据。</p> <p>（五）已经缴纳的罚款不应从生态环境修复费用中抵扣。</p> <p>■法律适用：</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 <p>■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p>
法理分析	<p>本案中较其他案件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试点开展以来国内第一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进入的二审程序的案件。本案属于环境污染引发的诉讼，专业性较强，在庭审时特别引入了专家辅助人参与到诉讼当中，就案件中涉及到的一些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问题提出意见；判决中法院结合污染损害实际结果和污染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以及生态修复难度等多重因素作出判决，合理地兼顾了司法的公平公正性和环保问题的公益性的平衡关系。</p> <p>本案在审理判决过程中，合议庭尝试将判决结果的裁量之中加入对被告违法行为主观过错程度的考量、同时还要考虑本案中排污行为的隐蔽性以及环境损害后果严重性等因素，最后合议庭在合理范围内确定了具有一定惩罚性质的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的数额，客观上加大排污企业的违法成本，在全社会范围上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让企业不愿排污、不敢排污，有效遏制企业违法排污行为的发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根本价值取向，但是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引入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因为环境损害行为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扩散性，很多情况下即使花费巨大代价也无法弥补生态环境的损失，而惩罚性赔偿带有一定的威慑性，既显示出法律对惩处环境侵权的决心，也能起到预防侵害的目的。</p> <p>另外，本案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这是全国首例检察机关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提起诉讼且进入二审程序的案件。在本案的二审程序中，二审法院严格依据《民事诉讼法》、《试点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司法实践操作。在该</p>

	<p>案的审理过程中，法院和检察机关遇到最为经典也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在案件进入到二审程序时，到底该如何确定一审中原告方检察机关称谓的问题。在以往普通的民事诉讼二审程序中，只存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二种称谓，在本案的二审中检察机关应该冠以什么称谓，是按照以往的惯例称其为被上诉人，还是仍然以一审程序中的公益诉讼人称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考虑民事诉讼中二审程序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兼顾了本案中特殊主体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自身特点，在二审判决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将一审中环境公益诉讼原告徐州市人民检察院列为被上诉人（公益诉讼人）。这种创造性的成为方式的不仅符合一般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特点，也可以体现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这一特殊称谓，这样的做法可以说对今后发生类似的工作实践情况，发挥着引领性的借鉴作用。</p>
--	---